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周 文 何雨晴

摘要: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能为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话语特征;话语体系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1.005

话语(discourse)一词在语言学中被认为是人们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相互沟通的工具与思维符号,也是一种具体的言语行为;而在社会科学中所讨论的话语,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表达,而且是承载、传递某些社会团体特定价值观、表达权力关系的语言。在话语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逻辑将零散碎片化的话语整合形成具有系统性、严密性、规范性、完整性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这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就是话语体系。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话语体系^①。因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内核就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中国价值观的外在体现。

构建话语体系的最直接目的就是提升话语权,因为一个国家的话语权代表了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在当今世界,国际地位不仅需要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的支撑,国家软实力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提升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②话语权的竞争往往是在同一个领域内的,纵观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下,经济学家形成了具有各自特征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个时代占据主要话语权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就是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经济学,并且拥有经济学话语权的国家往往就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该话语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最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世界各国解决经济发展中各种问题的首要理论指导,可以说,经济学的话语权决定了世界经济的方向和方式。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能为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7DZJ011)。

作者简介: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zhou59201@163.com);何雨晴,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569329245@qq.com)。

^① 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人民日报》2012年7月11日,第7版。

^②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89页。

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却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②

一、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

在经济学科诞生的 200 多年里,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断变迁,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流经济学的不断更迭是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矛盾变化的产物。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两次大变迁,英国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世界经济中心,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重心是在英国;到了 19 世纪末,美国超越了英国,使世界的经济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于是迎来了经济学的美国时代。可以看到,长期以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笼罩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下,即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占主导的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为主的经济理论。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我们更有必要首先对西方经济学及其话语特征加以探讨。

(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

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中,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是对立的,在其思想史上也经历了去意识形态转而追求科学性的过程。在经济学诞生之初,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研究的重心从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研究是实证性和规范性的统一,既运用了抽象演绎的方法,也运用了现实归纳的方法。之后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次革命,主张以“纯粹的”经济理论来建立经济科学,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的科学,推动了经济学的实证化^③。19 世纪 70 年代的边际革命排除了有关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科学和伦理学彻底分离,从而力图构建“客观的”经济理论。同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受其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此朝着“硬科学”的方向发展。演变至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在发展,在价值中立、数学范式等理性主义的庇护下标榜着自身的“科学性”,强调要摒弃意识形态。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始终代表的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都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在很长的时间里统治着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不涉及任何伦理的价值判断,具有“价值中立”的性质。如内维尔·凯恩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实证科学,要求经济学家在做理论研究时,应该完全不涉及实证结论的伦理的或现实的意义,这些实证结论才是所要确立的主要目标。”^④西方经济学这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同样反映在其研究对象上。奥地利的门格尔认为,“理论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只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算活动的条件”^⑤,瓦尔拉斯指出“纯粹经济学本质上是,在

①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习近平:《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25 日,第 1 版。

③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彭逸林、商金艳、王威辉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年,第 2 页。

④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党国英、刘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36 页。

⑤ 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絮散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 年,第 3 页。

完全自由竞争制度假设下确定价格的理论”^①,杰文斯则主张把经济学视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②。发展至今,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了罗宾斯所描述的“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③。

随着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地位的确立,涉及价值伦理判断的规范研究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此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等规范性的研究对象被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经济学研究对象仅仅是价值无涉的“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虽然西方经济学通过强调“价值中立”证明其“科学性”,但必须指出,西方经济学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和制度安排,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特定利益集团的权益,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④。

因此,经济学研究根本无法实现“价值中立”,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实证主义”的“科学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无论是从数据的收集、模型的构建,还是实证分析的过程,都会涉及经济学家个人的价值立场。马尔库塞则直接对西方经济学家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性”提出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实证主义,或者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甚至用实证方法发展起来的科学和技术都是意识形态^⑤。

(二)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话语体系

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中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西方经济学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说为逻辑展开的起点,把人类复杂的经济关系单一地归结为追逐财富的欲望。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经济人”进行了论述,理性和利己是“经济人”的主要特征。随着经济思想的发展,“经济人”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内维尔·凯恩斯为“经济人”假说的合理性作出了如下论述:“除了追逐财富这种欲望之外,人的其他动机当然也存在,并在不同情形下决定着人的经济行为。但这些动机的影响是散在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靠的,因此经济科学主要的学科范畴‘经济人’这个抽象完全是合理的和必要的。”^⑥

然而,这种理性的“经济人”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假定,实际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特征。西方经济学把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利己行为视为“理性的”,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了合理性,掩盖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即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人”假说鼓励个人追求利润,在个人利益满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其根本目的是促使资本不断增殖,以满足资本家对资本无限的欲望。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西方经济学却将其视作为人类共同的自然本性,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由此可见,“经济人”假说的本质是以资本为中心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建立在“经济人”假说之上的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完全是为资本而服务的。

(三)西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运用

从边际革命之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杰文斯主张“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其理至明,因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经济量及其关系,但一切的量与量的关系皆属于数学的范围。”^⑦数学方法确实在解释很多经济问题时具有不可替

① 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6-17页。

②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页。

③ 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

④ 吴易风:《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年第3期。

⑤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3-164页。

⑥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12页。

⑦ 斯坦利·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0页。

代的优势,凯恩斯认为数学方法不仅准确和精确,而且简明和避免累赘^①。西方经济学倚重数学方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经济学更加‘科学’”,从而促进经济学的发展。

但是,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了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②。把从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事实放入到一定的经济理论中,运用数学推理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孤立的分析,经济学的研究变成了对技术理性的崇拜,违背了经济学本身应有的学术性。卢卡奇曾指出:“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③科学的研究不应该用牺牲现实性为代价而去追求数学推理上的严谨和精确,数学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经济学的本质和目的,不能为了数学而数学。

另外,随着数学语言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的地位日益提高,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种“黑板经济学”,与现实中的普通人日益疏远。因为复杂的数学语言限制了普通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最终导致能够进行经济研究的人都是具有一定数学研究背景的人,数学方法的过度使用在无形中提高了经济学研究的准入门槛。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要的话语权,西方经济学话语在不自觉中与资产阶级话语画上了等号。

(四)西方经济学普适价值背后的政治经济意图

现代西方经济学借助抽象演绎、数学方法等自然科学的工具,在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发展成为一门“中立的”实证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抽象的方法不涉及任何历史性质和社会特点,所以经济学应该是世界性的经济学,将抽象推理的结论运用到不同现实社会中是可行的,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普适价值。在西方经济学话语中,普适性被认为是一门“科学”应有的特性。近百年来,美国作为主流经济学的阵地,向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推行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等政治经济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进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在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广为传播。由于西方经济学鼓吹的“普适性”,使得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经济学趋之若鹜,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奉为“金科玉律”。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却让我们看到,这些效仿美国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而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仅在经济发展上深陷困境,而且社会矛盾也愈演愈烈,直至今日也没能找到破解的方法。从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经验来看,不顾各国的历史、经济基础、社会和文化特点,教条式地推行某种经济政策主张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经验表明西方经济学这种所谓的“普适价值”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纵观整个世界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分布与20世纪末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落后地位。国际化变成了西方话语的单向输入,现代化也变成了单向的西方化,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被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一手掌控和控制。通过经济学普适价值的话语渗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干涉,扰乱这些国家本身的发展轨迹,隐藏在其背后的根本政治经济意图是扩大本国政治经济利益,巩固本国的世界垄断地位,以便让自己在国际上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and 话语权。

二、中国经济学的话语基础及主要特征

(一)中国经济学概念范畴源于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经济学研究在历史

①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第169页。

② 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4页。

演进中形成了非常多的学派,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划分,主要分为两大范式: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古典理论范式,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这三个概念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是具有同一性的^①。中国经济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概念与范畴也必然源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科学成分的基础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背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辩证法,按照经济现象、经济本质及两者的统一这一路径,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主要规律^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能够深刻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的学说,是被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资本论》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的经济范畴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如劳动、价值、剩余价值、资本等等。其中关于生产关系的话语体系,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及其特征,各类经济规律,工资、地租、利息等分配范畴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③。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具体的中国国情,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探索实践,七十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这一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例如在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应该被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而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立足于这一国情,我们在改革过程中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独创性的概念范畴,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是对我国成功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对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来说还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为基础,结合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对中国经济学概念范畴进行拓展和创新。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

在经济思想史上,无论什么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发展都具有各自社会文化的印记。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其理论大厦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为逻辑前提,以追逐财富为最终目标。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延绵不断的文明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思想。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兴盛和传承之地,主流文化背景是比基督教文化更有包容性、现实性、广泛性和开放性的儒家文化。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涌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开端,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学是“拿来主义”。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深受苏联的影响,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导致了教条主义的盛行。改革开放后,西方经济学大规模地引入中国,人文传统依旧没有得到重视,而是套用外来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实践,不顾中国国情将外来经济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的实践,由于国情不同,其结果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

① 周文:《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

② 张新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需明确的几个问题》,《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③ 洪银兴:《〈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经济学家》2016年第1期。

导中国的经济实践活动。与此同时,由于人文因素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也一直滞后于实践的成功。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经济思想远比西方经济思想起源早、影响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就在各自的学说中体现了丰富的经济思想,从孔子理财学到孟子治国思想,关于人性论、义利观、富国强民思想等等早已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有所论述。西方经济学中奉为圭臬的“自由放任”思想在春秋时期老子的思想中就有所涉及,“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所体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与其好友惠施的“濠梁之辩”。西汉初期,推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表达了反对君主对国民经济过多干预和控制的观点。在西汉中后期,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整理的《盐铁论》,核心是以桑弘羊为首倡导的国营垄断和贤良文学为代表的自由经济之争,应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府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两大经济思想的交锋。

总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有很多优秀的文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推动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创新,需要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强化经济学的中国理论。

(三)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吸收了18、19世纪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因此要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既要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的成功实践经验,也必须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也是长期探索取得的智慧成果,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排除其阶级属性,西方经济学对当代经济运行规律和现象问题的理论分析有科学的成分,因此中国经济学在构建的过程中不排斥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供需理论、市场经济理论、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等等理论对中国经济学中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的完善有其借鉴价值,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完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也是有裨益的。西方经济学中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同样也可以被吸收、改进和利用,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术语革命”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学话语的概念与范畴。马克思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使用的“价值”这一范畴进行了“术语革命”,赋予了“价值”范畴以新的、科学的含义,即“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另外,对西方经济学中实证分析方法的运用,中国经济学也不排斥。马克思在经济学阐述和分析中,也不乏数量分析和把经济现象数学化的例证,数学模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中国经济学中得到普及和推广是一种规范化的表现,具有积极的意义。科学和综合地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但要警惕“用正确工具得出错误结论”的情况,避免过度数学化、模型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广泛吸收国际先进的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包括主流的,也包括非主流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充分“引进来”国外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才能更好地“走出去”成为世界认可的、学术前沿的经济学话语。

(四)阐释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核心

中国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系统化梳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并形成理论学说,就是中国经济学最大的贡献。纵观经济学发展史,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西方经济学关注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是各个经济学派争论的焦点,也是经济学上的世界难题。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中,市场与政府始终是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多数时候是主张自由放任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条,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国经济奇迹在经济学上的体现就是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将社会主义制

度下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学理阐释清楚,形成系统化规律化的理论学说。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的长期探索过程。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标志着对市场和政府关系认识的一个飞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创造性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取得了伟大成功,更是在理论层面对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的重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①市场经济由于其开放性、竞争性、交易性等显著特点,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有显著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盲目性和不确定性等弊端,而政府调控可以起到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弥补了市场失灵可能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总量失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使微观经济主体保持生机活力,同时也发挥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积极调控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于经济运行,既克服了市场失灵,又避免了政府失败。

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所构建起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范畴,新中国七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因此,在理论层面阐释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至关重要,这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

(五)服务好国家治理是中国经济学话语的立论前提和基础框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②。国家治理学说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强调了各个领域之间的协调统一和整体联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框架。经济建设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治理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因此,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需要在国家治理的基础框架下进行,是国家治理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国家治理也是中国经济学话语的立论前提。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开始国家建构的国家,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实现了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治理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③。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美国次贷危机、英国脱欧、西欧债务危机等,关键在于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赶超。良好的国家治理不仅为中国经济学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贡献了有力的成功经验事实依据。

中国经济学作为研究和揭示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学说,是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与现代形态之上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应该在国家治理的基础框架下依据理论逻

①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3-64页。

②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

③ 周文、何雨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财经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的原则,阐释好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经济发展成就背后的经济学理论逻辑,系统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减贫伟大实践取得成功的经验,从经济学理论上系统解释中国国家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

三、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问题

(一)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国家主体性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与国家治理一样具有国家主体性,两者是有机统一的,共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所谓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就是经济学的国家立场。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经济学家对其所在国家的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或是为了解决其所在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体性。“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 1615 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重商主义关注的是国家财富的积累,追求国王强大、国家富强,体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体性。

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目标是“富国裕民”,其经济理论的本质是为英国国家服务的,只是因为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主张使政治经济学披上了世界主义的外衣,掩盖了国家主体性。与工业化遥遥领先的英国不同,德国工业化起步迫切需要国家的力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古典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特点,他在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强调“国家”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忽视,主张以关税保护幼稚工业。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战略在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同样强调了国家和国家主体性。马克思指出国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管理整个国家的共同事务;二是具有阶级统治职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①。在这之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很多的流派,尽管有些学派强调自身理论的世界主义,但本质上每一个派别和体系都有很强的国家主体性。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中国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分析中国经济走势、引领经济新常态、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②。因此,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凸显国家主体性,立足于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系统化研究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及其变化规律。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学是关于治国理政的系统化经济学说,是服务于整个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经济学理论^③。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国家治理为经济学理论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检验。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国家主体性体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④。在国际维度上,国家主体性指向经济学的国家特色,中国经济学提炼和总结的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中国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进行“术语革命”。在国内维度,国家主体性指向作为国家公共权力实际代表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作用和主体性地位,表现在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辩证处理。经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主体性主要体现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克服了市场的弊端,培育和营造良好的市场外部环境,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正确引导产业发展促成可持续发展。

① 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9 期。

② 简新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济南:济南出版社,2019 年,第 31 页。

③ 周文:《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2020 年第 7 期。

④ 周文、包炜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问题》,《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 9 期。

(二)阐释好中国道路

中国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教科书”,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要以基本国情为前提,更要从学理的高度阐释好中国国情。国情是一定时期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基本情况的总称^①。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现实条件,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必然产生不同的国情。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正是在这样的国情判断下,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

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明确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当前我国所处的“初级阶段”对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初级阶段”,显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发展变化了的国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战略,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指引。

国情是基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作出的基本判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话语要能够阐释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背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我国国情的本质作出系统性的理论解释。只有阐释好中国国情,并立足于国情,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指导。

(三)服务好国家战略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结构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三大战略举措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源动力,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③。党的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迫切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完成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新的历史阶段的国家战略目标,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④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最关键的是现代化的经济制度,而制度的建设就需要依靠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来提供科学的、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从目标导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为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服务。

(四)揭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假象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要注重自身的科学性,还要揭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假象。西方经济学通过价值中立、实证分析、数学推导等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来强调本身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然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科学性”不应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因为经济学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检验其理论的精确性。经济学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演绎归纳得来的社会科学,任何经

① 白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视角下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党史博采(理论)》2018年第5期。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5-77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济学理论都是内嵌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为了解决本国的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因此,经济学不具备完全意义上的普适性。

经济学的“科学性”应该以是否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否科学地揭示了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是否具有实践上的可重复性来衡量。显然,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所以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从抽象演绎的实证分析中推导出的结论才能被重复实践,是科学的,而具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分析则具有特定社会的现实特征,不具有可重复性,是不科学的。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不是相互排斥的,经济理论本身具有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和否认其代表和具有的阶级意识形态。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理论在拉美和东欧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长久的成功,反而使这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西方经济学标榜的“科学性”受到了现实严重的打击。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要揭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假象,证明西方经济学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公理,而且对现实的解释力正日渐式微。即使是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应该根据各国的国情来调整,更不用说在发展中国家,其适用性更加大打折扣。因此,中国经济学在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揭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假象,从而才能解构“西方中心论”,走出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经济学。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Economics Discourse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Discourse System

Zhou Wen He Yuqing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P.R.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economic theory has always been shrouded in the modern discourse of Western-centrism under the western economic system, which can neither explain the changes in the real world, nor provide a prescription for the sluggish world economy.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e than 40 years ago, its economic growth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but the western economic theories cannot explain the miracl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nswervingly followi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key to China's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 China's practice has broken the "myth" of Western-centrism, but it has not formed a set of systematic, complete and rigorous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discourse system is an inherent theoretical appeal of systematizing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China.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economics discourse, puts forwar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reveal the scientific illus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highlight its national subjectivity, explain China's path, and serve its national strategy.

Keywords: Western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y; Chinese economics; Discours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system

[责任编辑:纪小乐]